

论符号人类学中的感觉质研究

薛 晨

摘 要: 梳理对感觉质的哲学探讨, 可以发现, 哲学界对于感觉质尚未达成较为统一的看法。作为现代哲学中最早提出感觉质概念的哲学家皮尔斯及其创建的以现象学为核心的符号学理论, 可以为感觉质探讨提供一套新思路, 一套新的意义学框架。感觉质作为第一性的事实, 是作为第一性的对象品质的实例化, 它从指示性和像似性两个方面指代符号品质。在指示性转向中的符号人类学家通过对感觉质理论的改造, 为其广泛意义上的感官和感觉的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工具, 不仅梳理出皮尔斯符号学中的感觉质理论, 而且从根本上拓宽了符号人类学的研究范畴, 并推进了研究范式的创新。

关键词: 符号人类学, 感觉质, 感官, 皮尔斯

On “Qualia” in Semiotic Anthropology

Xue Chen

Abstract: The philosophical community has failed to reach a unified view on qualia. As the first modern philosopher to propose the concept of sense quality in philosophy, Peirce with his creation of a semiotic theory centred on phenomenology provides a new set of ideas and a new framework of meaning. Qualia as the fact of firstness is an instantiation of object quality and refers to object quality in terms of both indexicality and iconicity. By extending the theory of qualia, semiotic anthropologists provide theoretical tools for broad cultural research on sensuous and sensory studies, by not only ordering the

theory of qualia in Peirce's semiotics but also fundamentally broadening the scope of semiotic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and promoting an innovative research paradigm.

Keywords: semiotic anthropology, qualia, sensuous, C. S. Peirce

DOI: 10.13760/b.cnki.sam.202202007

纵观社会文化人类学发展，对感官问题和感觉问题的阐释与研究一直都是其理论探讨的题中之意。身体感官的各种感受，不仅蕴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每时每刻、每个细节，还蕴藏在人类获义的初始环节，更是人类对社会、文化现象认知的第一步。感官和感觉是人类建构物质文化、社会关系、意义世界的重要材料，因此对于人类学，特别是符号人类学来说，研究感官和感觉具有根本性意义。事实上，感官研究和感觉研究早已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的重要学术传统。人类学家分别从不同的学术路径，诸如感官人类学、身体人类学等，聚焦于从人类的基础感官，如嗅觉、视觉、味觉、触觉与听觉认知开始，到如好胜感、无助、孤独感、距离感等复杂感觉，进而考察人与环境、物质文化、文化社群之间的关系，并进而思考人类制度的阶序、资源分布与权力等问题。

在此背景下，符号人类学对感官和感觉问题的研究转向以“感觉质”这个术语为核心，以皮尔斯符号学为理论指导。符号人类学界第一次正式提出“感觉质”讨论是在穆恩的开创性著作《加瓦的名声：马西姆社会价值转变的象征性研究》（*The Fame of Gawa: A Symbolic Study of Value Transformation in a Massim Society*, 1986）中，她以人种学的方式描述了柔软、轻盈、清晰、疼痛、臭味等感觉质是如何在话语、历史与政治语境下传递其社会文化价值和政治权利意义的。自此20年左右的时间里，感觉质的研究作为一条隐线贯穿在符号人类学家的研究脉络中。2010年以纪念穆恩和她的著作为名，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举办了一场以感觉质为主题的学术会议，而后2013年《人类学理论》（*Anthropological Theories*）期刊推出第一个以“感觉质”为题的专辑，由此开启了以穆恩、盖尔（S. Gal）、查姆利（L. Chumley）、哈克尼斯（N. Harkness）、那卡西斯（Nakassis）为代表的符号人类学家投身感觉质研究的思潮。从对感觉质的理论梳理和延展，到对具体感官和感觉研究的广泛应用，该思潮着力探索感觉质在社会群体的感官研究、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具身问题、情感问题等符号人类学领域的实践可能性和可行性。

一、“感觉质”概念溯源

“感觉质”(qualia, 单数 quale)^① 一词来自拉丁语, 意为“何种分类”。“感受质问题是当代西方心灵哲学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如何解释感受质关系到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础问题。”(江怡, 2009, p. 86) 感觉质涉及事物所具有的某种品质, 当代心灵哲学认为我们在感受到音乐是愉悦的、火焰是红色的、针扎是疼痛的等状态下所经验到的事物的特殊品质, 就是感觉质。据查, “qualia”最早在英文文献中出现是乔怀特(Benjamin Jowett)于1875年所译柏拉图《美诺篇》将美德的“本质”(quid)翻译为“quale”, 意在表达“是这种的, 或具有这种性质的”(刘玲, 2013)。这里, 感觉质(quale)就被乔怀特用来描述一个事物所具有的性质。感觉质可以被看作构成经验的现象特征的组成部分, 当我们经验到某种事物或现象时, 就会意识到某些特定的性质, 这些特定性质一起构成体验中的事物或现象特征。以味觉中的酸、甜、苦、辣为例, 它们是对食物最显著性质特征的描述, 也是人们体验中这些食物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 如蜂蜜与甜、柠檬与酸、盐与咸, 等等。

现代哲学普遍认为“感觉质”一词主要是由刘易斯(C. I. Lewis)引入的, 他开启了后来哲学家们讨论这个问题的先河。他在《心灵与世界秩序》中谈道:“在对一个对象的经验中, 其被给与的要素(given element)就是一个呈现(a presentation), 这样一个呈现又是一个历史地唯一的事件。……在任何呈现中, 这个内容或者是一个特别的感觉质(quale)(如直接被感知的红或声音), 或者是可以被分析为这样组成物的东西。呈现作为一个事件, 当然是唯一的, 但是组成它的感觉质(qualia)却不是。它们可以从一个到另一个的经验中被识别出来。”(Lewis, 1929, p. 60)感觉质就是组成感官经验的一个基础要素, 这个基础要素是有共性的, 是可重复出现的, 且感觉质是不可言说的, 是由一些“看上去是”这样的说法来暗示的。

感觉质引入心灵哲学后便在其内部得到了广泛的探讨, 至今仍是一个持续争论的话题。与刘易斯将感觉质与感官联系起来不同, 费格尔进一步将直接经验与感觉质联系起来, 并提出这种直接经验在具有主观性和私人性的同时, 也可以通过亲知(acquaintance), 即经历过、享受过或曾遭受过直接经

^① 本文将“qualia (quale)”翻译为“感觉质”, 意在与符号哲学术语体系保持一致性。江怡等学者曾将其翻译为“感受质”。

验本身得到了了解。(Feigl, 1958 [1967], pp. 25 - 47) 感觉质还被理解为一种心灵的随附现象, 这种随附性对物理世界并不产生影响。20 世纪 70 年代起, 功能主义成为心灵理论的主流后, 感觉质的讨论热潮到来, 各种定义也不断涌现, 如内格尔描述感觉质为“拥有一种经验像是什么样子”(what is like to be), 布洛克认为感觉质包含了我们看、听、嗅的方式, 可以被称为“原始感觉”(raw feelings)、“主观性质”(subjective property)等。

除此之外, 当代哲学家中讨论感觉质的还有查尔莫斯(D. Chalmers)、克里普克(S. Kripke), 他们站在属性二元论角度, 认为感觉质本质上是非物质性的, 需要靠主观体验把握。丹尼特(Daniel Dennett)提出了感觉质的四种特征: 感觉主体的个人经验私人性和内在性, 即感觉经验是主体自身的、内在于主体感受的特征; 感觉质的不可言喻性和直接接受性, 即感觉质无法用言语描述, 除非主体自己体验到, 它是可以直接地被主体感知到并理解到的一种体验。(1988) 詹姆斯(William James)将感觉质与感官密切联系在一起, 他注意到每一个感官上感受性的不同, 甚至每个人体内的器官在感官上都有各自不相同的感觉质, 例如肾炎的感觉质就不同于肝炎的感觉质。

然而心灵哲学对感觉质的探讨也未能达成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感觉质是物理属性还是非物理属性? 感觉质是幻觉就需要被取消吗? 感觉质具有主观意识的特征是否能够包含在基于因果的心理描述里? 感觉质能还原成意向内容吗? 种种问题仍旧存在。很多辩论过度看重这个词在行为主义、功能主义和物理主义中的定义, 不同哲学家或强调或否定感觉质特定特征的存在, 对感质的定义仍然有争议, 这些都归咎于它不是一种可以实证的物质。

实际上, 在刘易斯引入感觉质以前, 在现代哲学讨论中, 皮尔斯是最先将感觉质与意识、意义问题联系起来的。《感觉质缘起》(The Origin of Qualia)一文指出:“虽然感觉材料很大程度上是英国人发明的, 然而可以说是美国哲学发明了感觉质。第一个在现代意义上使用‘感觉质’的哲学家是皮尔斯。”(Crane, 2014, p. 61) 皮尔斯在 1866 年提出:“每一种感觉(sensation)的组合都有一个独特的感觉质(qualia)……每一天和每一周都有一个独特的感觉质——我的整个个人意识有一个独特的感觉质。”(CP 2. 223)然而皮尔斯对于感觉质的理论推进和探讨长期被学界忽视, 以致对皮尔斯的感觉质理论的探讨和梳理几乎一度是空白。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 符号人类学学者重访皮尔斯的感觉质定义, 并在其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以感觉质为理论核心的符号人类学。

如果我们重访皮尔斯的符号现象学, 就有可能找出一条分析感觉质的独

特的意义理论之路。与心灵哲学对感觉质多路径、多视角的火热讨论不同，皮尔斯看似对“感觉质”这个术语并未展开过多讨论，实则其感觉质理论暗藏于其现象学思想和符号学思想脉络之中，并且对意义的认知和经验问题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心灵哲学中的感觉质要解决意识中的意义的经验问题，皮尔斯符号学体系正是思考符号意义过程，着力寻找意义形式规律的思想，皮尔斯符号学以“三元思想”为核心，以现象学为基础，能够为我们思考感觉质提供一个新框架、新方法。

二、符号人类学重访感觉质

皮尔斯的现象学为符号学思想提供了一个“普遍形式”，即他提出的“三元思想”。他不仅对符号展开了一系列三分式的分类，而且将符号的各方面都一分为三，因为他认为意义规律服从一个更本质的形式，即“现象学式的三分”。皮尔斯认为有三种存在模式，其中第一性（firstness）是“显现性”，是“首先的、短暂的”，例如汽笛的尖啸；当它成为要求接收者解释的感知时，就获得了“第二性”（secondness），成为“坚实的、外在的”，能够表达意义的符号；最后，“我们就会对于我们所看到的事物形成一个判断，那个判断断言知觉的对象具有某些一般的特征”，这就是第三性（thirdness）。（皮尔斯，2014，pp. 9 - 11）第一性范畴中包含了现象的诸种品质（qualities），比如红、苦、乏味、硬、高贵等。哪里有现象，哪里就有品质。第二个范畴是由实际事实（actual facts）组成，品质一般是模糊的或者潜在的，事实和事件则是个别的，是此时此地的。第三个范畴，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法则、思想，它是一般性的。（CP 1. 418 - 420）

在三元体系下，根据符号的呈现品格，可以将符号划分为质符（qualisign）、单符（sinsign）和型符（legisign）。所谓符号的呈现品格，也就是符号能再现其对象的能力基础，于是，符号的呈现品格就是符号再现的基础。首先，从为符号提供再现能力的第一种品格来看，若某物是红色的，由于这个原因，该物成为一个符号，即当符号的呈现品格与其属性特征有关，且符号因此属性而成其为符号时，它被称为“质符”，也可以叫作“风格符”（tone）。（CP 4. 537）其次，当一个红色报警器正在闪烁并发出警报声，这个报警器因为红色和警报声而成为符号。在这种情况下，符号的呈现品格指的是其存在品质，被称为“单符”（token）（CP 2. 245），也可以叫作“个别符”（token），也就是说，单符的实例化对其获得再现能力起到了决定性作

用。最后，当人们看到闪烁的红色报警器并将其理解为警告的信号时，这一事实帮助红灯获得了再现其对象的能力，这种符号被称为“型符”，也叫“类型符”（type）。（CP 4. 537）那么就符号自身而言，质符是作为符号的一种品质（quality）而存在的，然而除非它被具体化，否则它不能实际地充当一个符号。质符经具体化而形成的单符是一个实际存在物或者事件，它包含一个质符或者多个质符。质符属于一个特别的种类，只能通过实际具体的方式，才能成为一个符号。

那么进一步按三元体系进行划分，作为第一性的质符与品质、感觉质的关系如何？实际上，品质是作为质符的第一性存在的，品质是指抽象的、未实例化的属性；感觉质作为质符的第二性存在，是指实例化或具体化为实物或事件的品质；质符作为符号的一种品质（quality）而存在，是第三性的。符号的品质可以被理解为“抽象的潜能”，例如看到红的颜色、听到火车鸣笛的声音等，“红色”这一符号品质不仅在被看清的事实下是红色，在黑暗中仍旧会被人视为红色，因为连贯性（consistency）迫使人如此思考。整个现象宇宙都是由可感知的品质构成的，诸如红色的、酸的、痛的等每种品质都是独特的、模糊的且难以言喻的。任何事物，无论它有多么复杂和异质，都有其独特的品质，即感觉的可能性。（CP 1. 418 - 420）

品质只有在具体实例中才能被体验到，即品质体现在感觉质中，因此感觉质就是对符号品质的实例化、具体化，是“有关外部事实的感觉，有关另一种东西的感觉”。突然升高的火车鸣笛声迫使我们进入某种习惯性的震惊中，是因为我们经验到鸣笛声调突然升高所带来的实例化的“震惊”感觉质，从而做出类似被惊吓到的身体反应，震惊就是一种意志现象。抽象品质的实例化必然被惯例塑造，也就是被文化范畴塑造，即被塑造为质符。例如，“新鲜的”和“热的”这样的属性可以以绿叶和火焰这样的实例被经验到，但我们还可以从任何特定的对象上超然地感觉到这样的属性，形成新鲜感和热感这样的感觉质，携带这种感觉质的符号就成为质符。然而质符只有被实例化为单符后才能成为一个符号，如一棵树和一个火把，当树和火把被人们规约性地理解为“新鲜”和“火热”的意义时，型符由此形成。正是文化的规约使得社群成员认定特定的符号具有特定的品质。

同时皮尔斯还区分了感觉质意识（quale-consciousness）和由注意力强化的意识，他将后者称为“生动性”（vividness）（CP 6. 222）。同时他强调感觉质意识元素的单一性（simplicity），认为“在感觉质意识中，只有一种感觉质，只有一种元素。它是完全简单的”（CP 6. 231）。并且一个感觉质意识

不能与另一个感觉质意识融合而不丧失其特性。例如，一个事物可以是蓝色的，也可以是坚硬的，因为“蓝色”和“坚硬”在感觉质意识中不被认为是结合在一起的；但某物不能既是蓝色又是黄色，因为这两者会融合，所以某物也就不再是蓝色或者黄色。因此矛盾原则中的积极真理是，感觉质意识只有一个元素。感觉质意识的单一性导致人们性格的多样性，每一个性格都由一堆习惯构成（CP 6. 228），单一性的感觉质意识进一步为塑造多样的习惯带来可能性。皮尔斯进一步强调，每个感觉组合的感觉质具有特殊性（CP 6. 223），且具有近似于康德意义上的统一性（unity）（CP 6. 225）。

从皮尔斯对感觉质的探讨来看，感觉质具有元素单一性和统一性，同时，作为第二性，它是关于符号对象的品质的事实，并将进一步被法则化、规约化为习惯、思想和知识等第三性。感觉质不仅是个体对符号对象的品质事实的经验，还是社群共享的品质经验，同时也可以塑造社群共享的习惯与规则。因此，从品质到感觉质再到质符的演变过程，不仅是符号意义的产生过程，也是人类对符号对象从感知到认知的过程，更是知识的社群化生产过程。

从哲学传统来看，感觉质就是存在或属于心灵的感知和感觉问题，以及由对象引起的属性问题。因此，哲学家们不免对物质和心灵中感觉质是如何关联的问题展开思考。我们如何确定感觉质是否能可靠地代表或对应于事物的物质属性？对于颜色或味道这样的感官品质的体验是个人独有的还是群体共享的？如果不同的人声称他们可以有享有相同的感受质，那么是什么促进了这种主体间的意义共享呢？哲学家们已对塑造感知的主体间性理论进行了几个世纪的讨论，从而使感受质的共享体验成为可能，亚里士多德对逻辑范畴的讨论、康德对超验范畴的讨论、奎因及普特南对概念方案的讨论，等等，所有这些理论都试图解释心灵对感受的调解。

梳理皮尔斯的感受质理论，我们可以发现他对感受质的思考不是仅停留在主观的心理经验层面，更指向主体间性层面，指向社会文化层面。首先，感受质是普遍的主体间的、可重复的感受，因此可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心灵中经验地实现。处于相同时代的不同年龄的读者理解“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时，尽管解释会有差异，但总会产生相似的凄苦感、清冷感，当读到“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时，旷达、豪迈感油然而生。同时，尽管品质是抽象的，甚至是无法言说的，但感受质却是朝向交流开放的。当我们感觉到某个对象的品质描述起来非常困难甚至无法言说的时候，我们常希望通过交流使得这种感受质被他人理解。

此外，感觉质与对象之间存在复杂关系。尽管对象品质同一，但所产生的感觉质截然不同；尽管感觉质相同，却不一定指向同一对象品质，甚至不是同一对象。不同语言对“坚硬”（hard）也有不同的理解，可能有干硬（dry）、困难（difficult）、顽固（stubborn）、坚固（solid）、粗鲁（rough）、强硬（strong）、粗糙（rough），等等。（Perrin, 2007）据世界语言共词化在线数据库（Database of Cross-Linguistic Colexification），与“坚硬”（hard）共词化的节点有“强劲的、有力的”“困难的”“大声的”3个，其中与“强劲的、有力的”的共词化最为常见，共出现在18个语系（Families）的19种语言中，与“困难的”和“大声的”的共词化分别出现在9个语系的12种语言和9个语系的11种语言中。（贾燕子，2019）如果说词汇天然地具有语义的丰富性的话，那么人类生理上对于单一色光则具有单一感受性，但对单一色光的感受却可以产生不同的感觉质。著名的颠倒光谱思想实验说明不同的心灵针对同一对象可以产生不同的观念。实验假设一个孩子的眼部结构先天异常但并不影响对光线的捕捉，他眼中的“红色”在正常眼部结构中呈现“绿色”，即对红绿光线的感受发生了颠倒。但由于他从小被教育将看到的红色都理解为绿色，因此这种颠倒并不影响他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相同原理还有洛克的实验版本，说明不同对象也可以产生相同的感受质：紫罗兰使某人具有的体验可能会与菊花赋予另一个人的体验相同。

符号人类学对感官研究和感觉研究的重视与转向，也内在驱动其理论朝感觉质研究发生转向。以符号品质的感知研究为切入点，符号人类学以皮尔斯理论中“感觉质”术语为核心的研究范式应运而生，并将其应用于人类社会文化现象的感官与感觉研究，为符号人类学领域中有关感觉、物质性、具身性、美学或者情感问题的研究带来了有力且相契合的理论工具，成为拓展本学科内社会文化研究的新锋面。更重要的是，事实上皮尔斯并没有对感觉质进行更多的、体系化的讨论，而正是符号人类学充分挖掘并拓展了皮尔斯提出的感觉质概念，并将其完善为完整的感官研究理论体系，这也是符号人类学对当代符号学理论的反哺。

感觉质给符号人类学带来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将那些由符号产生却又被视为非符号的经验要素理论化和系统化。因此，符号人类学在重访感觉质理论时，对皮尔斯感觉质理论展开了深刻的思考。符号人类学强调将质符（风格符）与语言人类学的单符（个别符）和型符（类型符）联系起来考虑，并提出从皮尔斯的理论出发做出以下定义：感觉质就是“第一性的事实”（facts of firstness）或者在其第二性形式下的第一性（firstness under its

form of secondness) (Harkness, 2015)。那么, 品质可以被理解为第一性形式下的第一性, 即纯粹的第一性; 质符即第三性形式下的第一性, 同时也作为皮尔斯符号类型学的第一个分类中的第一性而存在。

感觉质是一种经验性的综合, 关注的是侧重经验特征的感觉统一体, 这也是感觉质意识的单一性的体现。赵毅衡提出形式直观是意义活动的根本出发点, 让有关观相呈现为符号。然而, 并非所有的符号品质都可以进入感知。意识要获得意义, 第一步是面向事物的形式本身, 获义意向画出事物被感知的范围, 被获义活动选出来代表事物的只有事物的特定观相, 并非事物本身, 这是获得意义的必要前提。这种片面的事物特定观相, 也就是感觉质前的未实例化的品质。片面化的特定观相, 需要经过统觉与共现, 以获得一个具有“最低形式完整度”(minimal formal integrity)的意义, 由此, 意向性才达到最起码的实现程度。感觉质之为某种经验特征的统一体, 也就是意识依靠意向性中的先验性或经验性统觉, 迫使对象的特定观相共现为意义的最低形式完整度。(赵毅衡, 2017, pp. 62 - 98)

因此, 作为对感觉统一体的统合, 感觉质被定义为“对感官品质(如颜色、质地、声音和气味)和感觉(如饱腹感、焦虑感、接近感和其他感)的体验”(Chumley & Harkness, 2013)。可以发现, 在此定义中感觉质所要考察的感官经验与感觉经验问题实际上都可抽象地理解为认知的“指代共现”问题, 即意识所感知的不一定是对象的一部分品质, 而是对象的这部分品质用某种方式与意义连接, 且可能是跨媒介的连接。(赵毅衡, 2017, p. 92)因此, 对感觉质的理解与皮尔斯提出的第二性从理论上内在地勾连起来, 这也与符号人类学整体的指示性转向的旨趣内在契合。

哈佛大学符号人类学家哈克尼斯(Nicholas Harkness)提出感觉质就是作为第一性的实例, 它们可以以两种方式代表品质: 像似性(通过似乎表现出某种品质)和指示性(通过暗示与某种品质的邻接性)。通过这两种方式, 品质的抽象性通过特定的感觉质被体验和认识(例如, 抽象的红色与苹果皮的红色)。(Harkness, 2013)西尔弗斯坦提出的符号人类学指示性研究中的核心术语“指示像似符”(indexical icon)(Silverstein, 1993, p. 52), 也正指明了指示像似性(indexical iconicity)是感觉质的符号功能的核心, 这也从理论内部解释了感觉质如何促进主体间的共同经验感的实现。

如果“任何被集中注意的东西都是一个指示符”(CP 2. 285), 那么感觉质则会以多样的模态将注意力集中在“行为的感觉”(feeling of doing)上。感觉质作为社会行动中的锚定点出现, 并塑造了这种行动被视为一种符合物

质可供性和限制的实践，实践以这种方式与社群联系起来，并成为有效生产群体内认同的关于“事物本身的样子”（the way things are）的某些知识，而非作为个人认知的“事物似乎是的样子”（the way things seem）。当人们想要通过感觉质来定位社群成员时，应当采取在主体间、交际中及更广泛的文化中的感官品质实践，而不是个人的主观经验实践。通过从感觉质出发把握人类意义活动，人类学家已经不仅能够越来越精确地解释感觉质的产生过程，还能更好地解释其后果，因为这有助于形成内在的或自然形式的意识形态。

三、感觉质的符号人类学实践

符号人类学对于感觉质的研究，并不仅限于人类对物质文化中具体物质品质的感知和经验，而是更宏观地放眼人类整体社会文化生活领域。符号人类学长期持续关注视觉、味觉、声音、嗅觉、触觉，及其他纷繁多样的人类感觉，如痛苦感、轻盈感、强烈感、新鲜感等问题。总体而言，目前符号人类学对感觉质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感觉质与语言人类学、线下和线上人际交往与社群认同、物质文化与城市文化，以及疾病、健康、性别与声音等身体问题方面。

首先，符号人类学对感觉质的研究最主要的成果体现在语言领域，这与符号人类学脱胎于语言人类学的传统密不可分。在语言研究中，符号人类学家更加关注语音。语言人类学家早期对感觉质理论的思考就主要从语音出发。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在文章《论交替的声音》（“On Alternating Sounds”，1889）中分析了天真的语言学家如何根据语音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正是携带意义的感觉质类别——从他们自己的语言中误解一种语言的声音，并提出形成经验的范畴和概念是属于特定群体的。声音研究种类繁多，感觉质的语言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声音形态（Jakobson & Waugh, 1979），如语音变化、声调轮廓、语音质感、拟声词和其他模仿符号等的思考上，并进一步将感觉质的声音形态研究拉入更广泛的符用学研究领域，使得声音与社会语境、文化语境勾连起来。如布尔迪厄强调将语言置于实践的语境中，他以“la gueule”和“la bouche”为例分别将法国言语和行为的两套系统定性为男性和女性，而这两套话语系统指向的都是“人类的嘴”（Bourdieu, 1977, p. 661）。通过将指示符规约化，言语形式中可辨别的感觉质的指示性极大拓展，物质符号载体与意义之关系被打开。

近年来的语言人类学的感觉质研究实践关注各种语言交流中出现的感觉

质之间的指示性。由于感觉质在社群、文化语境下被高度规约化，感觉质可以给语言带来高度的指示性影响和后果，甚至可以被视为交流体裁的替代性方案。例如盖尔在讨论德语和匈牙利语双语者对德语语言多样性的感官品质的作用时汇编了一份清单，借此说明记录语言实践中的感觉质对提升文化价值的重要性（Gal, 2013）。语言中对比性的品质词汇可以显示语言整体的差异，如斐济印第安人的“甜蜜的印地语”、澳大利亚原住民的“颠倒的瓦尔比利语”、有“茉莉花香味的”泰米尔语，等等。说英语的人可能会认为意大利语是柔和的、德语是严厉的，等等。语言，特别是语音的形式与感官的抽象品质包括声音、质地、味道、气味、形状和空间方向等高度关联起来。

语言的感觉质研究体现在语用学方面包括对某一社群的语言感觉质的历时性变迁研究，如考察爪哇语从“粗俗”到“普通”再到“精致、高雅”的语调变迁（Errington, 1988）；研究基于语言感觉质差异而产生的社群话语争端及其应对策略，如分析也门部落中的“好战派”和“柔和派”之间的问候方式（Caton, 1986）；探讨语言实践中新词派生与感觉质之关系（Eckert, 2000）。

其次，感觉质研究与传统部落和城市人际交往、人际关系和社群认同研究紧密相关。在社群关系中，感觉质的作用在于再现、建立、维持和转换人际关系和社会群体关系。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关系往往可以通过感觉质来快速判断，人际关系类型以及与这些关系相关联的规范性都可以用感觉质来进行标注，例如人们常常给社群关系贴上“团结的”“陌生的”“松散的”“上进的”“勾心斗角”等感觉性标签来描述成员之间关系的品质。社群关系感觉质直接指向其关系的品质特征。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科罗威的社群关系中存在显著的依恋和回避、熟悉和陌生等关系，史塔施关注这种社会关系是如何通过积极地管理触觉的、视觉的、饮食的和语言的感觉质而建构的，他认为对社会关系的感受实际上正是对社会行动品质和二者之间所产生的效果品质的感觉。（Stasch, 2009）

感觉质问题在当代城市人际关系问题中凸显出来，如东京的“冷漠”、纽约的“现代”、巴黎的“浪漫”等。野泽聚焦于东京给人的孤独感和冷漠感，思考现代城市中的他者和距离感、同一性和亲近感等问题。实际上，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冷社会”和“热社会”、麦克卢汉提出的“冷媒介”和“热媒介”，也都探讨过感觉质与社会关系、媒介与人际关系的关联问题，遗憾的是二人对“冷”与“热”没有做出更进一步的延展。

感觉质为网络人际关系、社群互动和媒介研究提供重要理论支撑。网络

和移动网络中的新型人际关系和圈层式社群互动形式导致新的人际关系感觉质激增，如粉丝感情的极端化、日常交际的孤独感、短视频依赖症等，都在感觉质层面与传统人际关系体现出显著差异。网络人际关系的感覺质研究不仅是对人们在新媒介下的表意方式和存在方式的探索，也是对新型生活方式下群体身份认同和权力关系的探索。如将作为物的叉车和铲车与“可爱的”感觉质进行意义勾连，从而实现群体关怀和群体认同黏合。（Wang et al., 2021）

再次，物质文化研究和城市研究保持对感觉质理论的持续关注。物质与物质文化向来是人类学的主要关注对象，结构主义符号学或象征符号学学者都对此领域有所讨论，他们将物品置于一个结构化的系统中探查其符号意义与价值。除了尚未知、或许不可知的物质世界，与人类意义世界相交会从而产生意义的物质世界，作为人类意识的观照对象，也是提供感知的符号对象，因此，感觉质的讨论天然地与物质世界紧密连接，从物品的品质讨论出发，包括媒介化的符号文本在内的物质都是可感的对象。因此，符号人类学对物质和物质文化的感覺质研究也是目前本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曼宁（Manning）的专著《饮酒与饮品的符号学》（*Semiotics of Drink and Drinking*, 2012）从水与伏特加、软饮与啤酒、咖啡与葡萄酒的对比中探讨物质的“耐用感”如何以质符形式再现潜在意义、规约品质，并且对感觉质产生的指示性实践和元指示性意识形态、话语和消费、身体和物之间的指示关系进行了多重思考。

对物质文化感觉质的另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就是现代城市文化。学者们的视角从城市日常或非日常物品和商品的感官感觉，如皮草的气味、钻石可见和不可见的奢侈感、烧酒的味道、品牌的仿冒感等出发，延伸到多模态的综合感觉，如公共媒体的功能失调、城市交通的失序、移动社交的虚拟感、艺术作品的优劣感、送礼的得体感等，勾勒出城市物质文化多样的、可识别的感质特性与城市文化意义建构的指示性逻辑。（Harkness, 2013; Nakassis, 2012; Larkin, 2008; Chumley, 2013）

最后，身体作为人类感官的载体，也是人类的获义对象，身体的感受不仅停留在生理性层面，更是社会、文化与历史共同作用的产物，因此身体与感官研究是人类学的一个长期学术传统。身体不仅作为感知主体是表意的综合媒介，也是承载感官的表意渠道，同时身体本身也是研究的对象，身体在物、符号与艺术符号三种符号功能之间来回滑动。在符号人类学对身体与感觉质的考察中，声音（voice）和表达（voicing）是两个主要的研究焦点。人类学家通过民族志研究将人类声音作为语音和声音实践联系在一起。声音作

□ 符号与传媒 (25)

为一种交流媒介，也是感知的对象，作为一种物质载体，它可以被倾听、操纵、占有并进入流通，也可以被具化和去身体化。声音的品质常被称为声音的质感，是声音美感和感官感觉的核心。声音的质感包括干净、沙哑、自然、清透、空灵、低沉等都与发音方式、歌曲表意、身体表达以及文化语境紧密联系在一起。（Engelhardt, 2015; Harkness, 2013）除声音外，手势、副语言、身体行为，如仪式中舞蹈的美感和特殊手势的指示意味等，也都被囊括进符号人类学的研究视域。

身体感官、感觉质与疫病研究和健康研究成为近年来的热点。作为与身体和身体活动直接相关的本体感觉之一，痛感是许多文化实践中文化语境的重要锚定点。痛感在芝加哥这个城市是社区记忆和社群活动的焦点（Ralph, 2013），同时也是美国拳击手男性主义的重要指示符（Alter, 1992）。另外，以疾病研究为例，患者的痛感表达研究对增强疾病的有效阐述，缓和医患关系具有推动作用；在韩国，针灸治疗中痛感表达的代际差别与治疗有效性之间的关系中，也蕴藏着代际文化变迁（Lee, 2022）；传统中医药消费不仅在历时性变化，同时也显现出明显的感觉质意义缩放和分层；养生研究发现北京人通过在公园运动来塑造身体健康感（Farquhar & Zhang, 2012）。

另外，感觉质的身体研究维度还包括对性别气质的探讨。这方面，感觉质最明显的意义体现在话语和陈规对有关价值观的身体实践的形塑。典型研究案例有莫斯对美国 and 法国女孩的行走技术的经典考察（Mauss, 1973），加芬克尔对一个变性人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再社会化的民族方法学研究（Garfinkel, 1967），杨对“像女孩一样投掷”这种感觉质的身体举止和运动的性别化思考（Young, 1980）

对感觉质的民族志研究，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表意过程研究。通过文化表意，第一性的事实在社会和文化中涌现。人类意义世界之广袤，人类感知对象之丰厚，从语言到符号，从声音到仪式，从个体到群体，从人际交流到社会关系，从商品到城市，从情感到文化记忆，都是其论域。感觉质理论不断推进与完善，将会成为符号人类学以及文化研究的新兴增长点。

引用文献：

- 格尔兹，克利福（1999）. 文化的解释（韩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 刘玲（2013）. “感受质”概念溯源. 自然辩证法通讯, 3, 60-63, 70, 126.
- 贾燕子（2019）. 词汇类型学视域下汉语“硬”语义场的历时演变, 语文研究, 4, 13-27.
- 江怡.（2009）. 感受质与知识的表达. 社会科学战线, 9, 28-34.

- 皮尔斯, C. S. (2014). 皮尔斯: 论符号 (赵星植, 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叶舒宪 (2002). 身体人类学随想. 民族艺术, 2, 9 - 15
- 赵毅衡 (2017). 哲学符号学: 意义世界的形成.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Alter, J. S. (1992). *The Wrestler's Body: Identity and Ideology in North Indi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oas (1889). On Alternating Sound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2 (1), 47 - 54.
- Bourdieu, P. (1977). The Economics of Linguistic Exchanges.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6 (6), 645 - 668.
- Blacking, J. (1977).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Body. *The Anthropology of Body*. London: Academic Press.
- Caton, S. C. (1986). Salām Tahīyah: Greetings from the Highlands of Yemen. *American Ethnologist*, 13 (2), 290 - 308.
- Crane, T. (2000). The Origins of Qualia. In T. Crane, S. Patterson (Eds.). *The History of the Mind-Body Problem*. New York: Routledge.
- Chumley, L. H. & Harkness, N. (2013). Introduction: QUALIA. *Anthropological Theory*, 13, 3 - 11.
- Dennett, D. C. (1988). Quining Qualia. *Consciousness in Contemporary Science*, 42 - 77.
- Eckert, P. (2000). *Language Variation as Social Practice: The Linguistic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Belten High*.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 Errington, J. (1988). *Language and Social Change in Java: Linguistic Reflexes of Modernization in a Traditional Royal Polity*.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 Engelhardt, J. (2015). *Singing the Right Way: Orthodox Christians and Secular Enchantment in Eston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arquhar J. & Zhang, Q. (2012). *Ten Thousand Things: Nurturing Life in Contemporary Beijing*. New York: Zone Books.
- Feigl, H. (1967). *The "Mental" and the "Physical": The Essay and a Postscript*. Twin Citi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Gal S. (2013). Tastes of Talk: Qualia and the Moral Flavor of Signs. *Anthropological Theory*, 13, 31 - 48.
- Garfinkel, H. (2013). Passing and Managed Achievement of Sex Status in an "Intersexed" Person. In Susan Stryker & Aren Aizura (Eds.). *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58 - 93. New York: Routledge.
- Harkness, N. (2013). Softer Soju in South Korea. *Anthropological Theory*, 13 (1 - 2), 12 - 30.
- Harkness, N. (2015). The Pragmatics of Qualia in Practic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4 (1), 573 - 589.

□ 符号与传媒 (25)

- Jakobson, R. & Waugh, L. (1979). *The Sound Shape of Language*.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 Larkin, B. (2008). *Singal and Noise*. Durham, N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 Lee (2022). Sounds of Healing: Qualia and Medical Efficacy in a Traditional Korean Medicine Clinic. *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https://doi.org/10.1111/jola.12353>.
- Locke, J. (1689/1975).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wis, C. I. (1929). Mind and the World-Order. *Chales Scibner's Sons*, 60 (14), 446.
- Manning, P. (2012). *Semiotics of Drink and Drinking*. London: A&C Black.
- Mauss, M. (1973). Techniques of the Body. *Economy and Society*, 2 (1), 70 - 88.
- Nakassis, C. V. (2012). Counterfeiting What? Aesthetics of Brandedness and Brand in Tamil Nadu, India.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701 - 721.
- Peirce, C. S. (1974).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 1 - 6, 1931 - 1935; Vols. 7 - 8, 1958).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errin, L. -M. (2007). Polysemous Qualities and Universal Networks. *Workshop Semantic Map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Paris.
- Ralph, L. (2013). The Qualia of Pain; How Police Torture Shape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thropological Theory*, 13 (1 - 2), 104 - 118.
- Stasch, R. (2009). *Society of Others: Kinship and Mourning in a West Papuan Pla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ilverstein, M. (2013). Worora Kinship and “Parenteral” Relationships. *Anthropological Theory*, 13, 89 - 103.
- Wong, J. , Lee, C. , Long, V. K. , Wu, D. , & Jones, G. M. (2021). “Let’s Go, Baby Forklift! ”: Fandom Governance and the Political Power of Cuteness in China. *Social Media + Society*, 7 (2).
- Young, I. M. (1980). Throwing Like a Girl; A Phenomenology of Feminine Body Comportment Motility and Spatiality. *Human Studies*, 3 (1), 137 - 156.

作者简介:

薛晨, 博士, 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四川大学符号学 - 传媒学研究所成员, 研究方向为符号人类学、传播符号学。

Author:

Xue Chen, Ph. D., associate professor at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semiotic anthropology, and semiotics of communication.

Email: xuechen_1988@163.com